

## 理论探索

## 推动“‘大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

□汪一辰

“大文学观”可以作“‘大文学’观”与“大‘文学观’”两种理解。前者指向文学边界的扩容,是数字时代人民文化素养提升后文学样态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后者则是一种具有未来性指向的文学理想,它呼吁的是可以传之后世的文学经典。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没有文学活动的大范围扩展,就难以激发全面的审美提升;没有价值理想与经典意识的持续牵引,文学的普及也容易停留在数量增长层面。因此,“大文学观”的任务,可以概括为,推动“‘大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也就是推动文学由广泛生长走向内在提升,由类型繁荣走向经典生成

新概念的生成,归根结底是面对新的实践,“语言的困惑”使得已有的概念工具已经无法进行有效解释,所以,新的概念或是对新实践的概括,或是基于对现状反思而寄托的新期待。“大文学观”的提出,可以说上述两种情况兼有。这可以从其两种读法展开讨论,即“‘大文学’观”和“大‘文学观’”。这并不是语言游戏。作为一种“前缀型”(在传统“文学观”这一语词前用“大”进行修饰)概念创构,其含义也应根据基本语素的排列顺序展开分析。这是进入研究首先应当厘清的工作。

## “‘大文学’观”是对当下文学现场的回音

“‘大文学’观”,即用一种“更大”的视野来审视“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追问哪些创作实践正在进入“文学”,或扩展了“文学”的边界。朱自清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就提到:“什么是文学?大家愿意知道,大家愿意回答,答案很多,却都不能成为定论。也许根本就没有定论,因为文学的定义得根据文学作品,而作品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这充分说明,“文学”并非一个先验固定的范畴,它的边界总是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而被不断改写。

一方面,“大文学”意味着基于已有文学实践,对新出现的文学形态进行有效观照。如果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大功绩,是将传统的“俗文学”(小说、戏曲、民间说唱等)纳入正统文学范畴,那么今天所谓的“大文学”视野,则试图在互联网空间里更为庞杂的创作进行发现与接纳。除了已被“正名”的“网络文学”外,还包括社交媒体上的素人叙事(微博超话故事、小红书笔记体散文)、轻量化短文体(公众号“软文”、豆瓣广播中的微型小说)、参与式社区文本(知乎问答体叙事、弹幕和留言中的即兴创作)等。对新的文学形态的发现与收编,本质上还是对众多创作群体的承认。这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大文学观”的讨论,是在“新大众文艺”讨论过程中生成的,这背后一以贯之的,是对人民大众创作主体性的尊重。这也是对文学写作和传播媒介发生巨变的及时反应。

另一方面,“大文学”还意味着,在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以“文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文学的存在方式。在以往,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之一,是文本建构是否以文字符号为核心载体。当下,视听媒

介高度发展,基于文字符号的创作或阅读,已不再处于文艺传播与接受格局的“风暴眼”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再重要,因为讲好故事、善于表达,一直是文艺的重要追求。例如,在电影中,受众固然关注导演风格、演员演技或视觉修饰,但它的“基本盘”仍是编剧所写的故事。可以说,在今天的“大文学”格局中,基于文字符号的创作依然构成其他艺术类型的重要基底,如短视频的文案、微短剧的剧本、脱口秀的台词、游戏中的叙事设计等。这些艺术类型当然不是“文学”,但却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传统以文字符号呈现的文学,延伸出“文学+”的存在形态。这并非简单的“文学性的扩散”,而是在媒介技术、艺术生产、传播结构与文艺接受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语境下,理解文学存在方式的应有视角。

## “大‘文学观’”中的重要寄托

如果说“‘大文学’观”是对变动中的文学现场的概念归纳,那么“大‘文学观’”则寄托着理想,这一理想是具有未来性的。在此读法中,“大”是对“文学观”的修饰。“尚大”本就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无论是“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还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大”并不是简单的数量之多、体量之巨或规模之宏,它还有一层形而上的含义,即包容广博、生生不息。《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更清楚地说明,刘勰论“文”的起点,就不是一种狭义的文体技巧,而是把“文”放在天地生成与人文秩序中来把握。那么,“大‘文学观’”中的理想寄托是什么?或许可以理解为,期望文学能够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起内在而紧密的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文学要同社会生活建立起内在而紧密的联系,关键就在于它能否真正进入“具体的人”的生命世界。“具体的人”,既是“人民”这个宏大概念的具体化,也是对抽象、空洞的“人”的超越。“具体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人”,带着日常的烟火气,有着朴素的愿望与烦恼。因其“具体”,所以“真实”,所以他们也是历史进程中“时代里的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折射出特定时代的风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对“具体的

人”的书写,才能真正把社会生活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内容。因为让读者读有所感、读有所思、读有所动的,往往不是某种空洞的概念,而是具体生命经验中所呈现出来的情感张力与精神境界。文学只有写出“具体的人”,写出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去爱、去痛、去追求、去奋斗、去承受,才能使社会生活获得感性的形式,也才能真正激发读者的共情共鸣。

故此,“大‘文学观’”之所以“大”,正在于它要求文学不断向生活的深处打开,将人民的现实处境、情感经验与精神活动纳入文学表现之中。不过,强调文学回到生活,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直接等同于生活记录。生活要真正进入文学,还必须经过形式建构和艺术提炼。正因如此,“生活”与“虚构”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相互牵引、相互生成的辩证运动,而这一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新中国初期的文学创作,洪子诚曾提出“一本书作家”的概括。其所揭示的,是当时一批作家在写作上较多依赖既有生活积累和切身经验,而相对缺乏虚构能力与艺术构型能力,“生活素材与情感体验很快消耗之后,写作的持续便成为另一难题”,所以这些作家往往就只有一本代表作。今天回过头看,1980年代以来“纯文学”的发展,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学创作中对于虚构、叙述和形式的自觉,提升了文学处理经验、组织现实的能力。当然,“大‘文学观’”并不是退回对生活的朴素依赖,也不宜停留于形式自足的文学观念之中,而应当在吸收“纯文学”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基础上,更高层次地回到生活本身,最终在审美创造中实现历史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 “大文学观”的可实践性

“‘大文学’观”与“大‘文学观’”,统一于“大文学观”这一概念之下。二者生动体现了当下文艺现场中“普及—提高”的辩证运动。“大文学”是数字时代人民文化素养提升后文学样态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而“大‘文学观’”则是一种具有未来性指向的文学理想,它呼吁的是可以传之后世的文学经典。二者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两套话语:没有文学活动的大范围扩展,就难以激发全面的审美提升;没有价值理想与经典意识的持续牵引,文学的普及也容易停留在数量增长层面。因此,“大文学观”的任务,可以概括为,推动“‘大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也就是推动文学由广泛生长走向内在提升,由类型繁

荣走向经典生成。

那么,“大文学观”是可能的吗?《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为4583.7万部,较2024年新增418.6万部。面对如此海量的作品,我们怎样展开有效的批评,找到那些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思想高度与深度的作品?与此同时,“大‘文学观’”中对“生活”的强调,在今天也遭遇新的理论挑战。当下,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写作者是否仍然能够有效突破自身经验边界,进入他人的生活世界?其次,在文学接受日益平台化、社区化的当下,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经验是否仍然具有充分的可交流性?进一步说,当公共生活本身越来越被算法切割、被兴趣社群分流时,所谓“共同的社会生活”,是否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预设?这些问题都说明,今天重新审视“生活”与“人民”,已经不能停留在朴素的现实主义信念上,而必须正面回应新的技术条件和经验条件。

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在1930年的《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他指出:“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功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鲁迅揭示了文艺大众化需要文学内部力量与政治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这一见解十分深刻。这里的“政治之力”,不妨理解为社会整体性文化氛围的营造、良性的文艺制度的建构,以及先进的创作“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王计兵通过诗歌,让我们“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感受到“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那般的生命力与震撼。这里的共鸣,超越职业,而唤起读诗者对生活的赤诚。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王计兵本人的“文学之路”和“被发现的过程”,这背后既离不开当代中国基层文艺传统的滋养,也离不开互联网强大的传播效能。当下,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而“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在今年2月1日正式施行。鲁迅当年的“提示”,正在逐步实现和向前推进。就此而言,“大文学观”是可能的,而我们需要的,是耐心、耐心地让制度、技术、艺术与人心在时间的淘洗中不断磨合,让“政治之力”与“文学之心”持续对话、相互作用。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译丛’与新中国初期文学论知识的中国建构(1949—1965)”项目编号:2024EWY001]的阶段性成果]

## 声音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头。而且,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二者难解难分。因此,一个作家,无论是喜欢写历史题材,还是喜欢写现实题材,都是值得鼓励的。题材本身也不会天然地决定着作品的质量。

然而,在散文创作领域,我们还是要警惕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作者扎堆以古代名人的生活经历为题材,描述其生平际遇的颠簸起伏,寻找其遍布典籍的逸闻轶事,偶尔还进行一番貌似很有逻辑的推理判断。还有的作者将文人的名篇不加节制地引用,一一对其进行诠释、注疏,然后凑成自己的一篇篇散文。可是,仔细阅读这些作品,作者既没有向我们提供新鲜的史料,也没有呈现他对于这些现实的独特认知,更加无法提供对当下现实的启示。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有作者对于旧有材料的重新归置。扎堆去写这些文字并无风致、思想并无启迪的散文,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很多人写不好历史名人题材散文,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历史名人所处的处境没有深刻的理解,更无法以穿透古今的思想力去深入挖掘这些历史内容的当代性。因此,很多写作者就会陷入故纸堆中无法自拔,只能东摘一点、西抄一段,最终搞成了资料汇编。实际上,要想写好这类作品,需要写作者真正做到博古通今。“博古”才能了解历史名人的生活与当时社会情境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通今”才能挖掘出历史名人与当下精神需求的隐秘关联,使古人的命运成为今人可触可感的镜鉴。缺乏这种双重视角的写作者,往往只能在表面打转,用华丽的辞藻包裹平庸的见解,用泛滥的抒情掩盖思想的贫瘠。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奉劝很多功力不足的写作者:别扎堆写历史名人题材散文了!文贵在真诚,贵在独特,贵在能给人以新知。如果写历史名人、历史题材不能写出新意、写出深度、写出与当下的真切联系,那么不妨将目光收回身边的现实。写写你所生活的城市的多样变迁,写写你在某个场合观察到的感人细节,写写你身边人之间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情感……这些来自真实生活的表达,往往比那些隔空抒情的“伪历史散文”更能打动人心。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中,我们不断锻炼自己发现细节、发现美的能力,提升自己通过“一花”看到“一世界”的能力。与此同时,在直面现实的书写中,我们也在锤炼一种更为珍贵的本领——那就是将日常经验转化为文学表达的能力,将个人感悟升华为公共关怀的自觉。当我们获得了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和总体认知,再返回来看待历史中的人与事,或许会“别有一番风味”。

因此,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历史名人题材的散文创作。相反,我期待看到更多真正有思想深度、有独特视角、有现实关怀的历史书写。我只是想提醒那些一窝蜂涌入这个领域的写作者:不妨先从身边写起,从此刻写起。毕竟,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无数值得书写的事情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用自己的笔,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真实而动人的记录。这,同样是给后来者提供生动的历史素材。

(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



本报讯(记者 教鹤然) 4月18日,由诗刊社、北京文学期刊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北京平谷梨树沟首届梨花季在平谷举行。活动以“春到梨树沟”为主题,“人民艺术家”王蒙出席并致辞,诗刊社主编李少君线上致辞。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任师力斌和来自高校的1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数十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儿童文学作家、研学机构代表参加活动。

王蒙回忆说,自己与平谷的缘分自1996年开始。在黄松峪乡刁窝村,他写下了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和大量的诗歌、散文、随笔作品,还翻译了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此次故地重游恰如重访旧友,在此谈读书、谈诗,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事。他认为,新媒体的发展使我们获得信息更方便和快速,但人类的灵魂依然需要深度。通过阅读,我们能够真正获得有启发、有认识的鼓舞与欢欣。

朗诵会上,多位艺术家朗诵了经典诗作与当代诗歌新作,充分展现了春日的美好与梨乡的风情。在当天举行的“诗歌与教育”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谈到,诗歌是承载美育使命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培养少年儿童感知、情感与想象力。要坚持推进诗歌教育,为孩子们的心灵注入诗的力量。

活动期间,诗刊社、北京文学期刊中心向平谷四中的学生赠送了最新出版的《诗刊》《北京文学》《东方少年》《北京纪事》等杂志。

## 北京平谷梨树沟首届梨花季系列活动举行

## 《光荣亭》记述基层治理创新故事

本报讯(记者 罗建森) 日前,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人民出版社、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福建省文联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光荣亭——来自才溪基层社会治理的故事》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以视频形式致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陈添贵,福建省文联党组成员、省作协副主席林秀美,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总编辑陈远,龙岩市公安局副局长李福民和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吴义勤表示,《光荣亭》题材独特、主题鲜明,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全书文风朴实、细节真实,作者以理性和感性交织的温情笔触描绘日常,让读者深切感受到警民同心的鱼水深情,体会到基层治理的智慧和温度,彰显了“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作家叶淑平的长篇报告文学《光荣亭》以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上杭才溪派出所为叙事蓝本,聚焦红色基因传承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题,展现了“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的基层治理新范式。

与会专家认为,《光荣亭》通过一个派出所的故事,深刻回答了红色基因何以在新时代绽放光芒、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在红土地生根结果的重大命题,为理解“中国之治”的基层密码提供了生动样本。叶淑平表示,这段经历让自己深切体会到深入基层调查的力量,未来将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 《张瑞玘传》研讨会在山西举行

本报讯 由山西省作协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张瑞玘传》研讨会近日在山西太原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一氓以书面形式致辞。山西省作协主席李骏虎、《传记文学》主编斯日古楞,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胡彦威,山西省评协主席杜学文等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李一氓谈到,《张瑞玘传》以厚重的史料、严谨的笔法与深沉的情怀生动还原了晚清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对新

时代传记文学创作具有丰富的启示性。

张瑞玘出生于山西,一生不仅在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事件中作出积极贡献,还在藏书、诗文创作与地方文献保护等领域深耕不辍,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卫洪平创作的《张瑞玘传》秉持“以史料立传,以真心著文”的治学态度,引用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不仅为还原历史细节、丰富人物研究提供了坚实依据,也对深化山西地方文史研究、丰富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体系作出了学术贡献。

## 八方文讯

## 以文学形式书写治沙历程

近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内蒙古文联、鄂尔多斯市文联主办的肖睿长篇报告文学《库布其生命歌》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海山,鄂尔多斯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赵慧洁,远方出版社总编辑孟庆微,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库布其生命歌》由远方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全景式记录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历程的报告文学作品。与会专家认为,该书既是一曲献给库布其治沙历程和治沙群体的深情赞歌,也表达了作家对沙漠治理及其历史进程的冷静思考。作者长期实地走访调研,生动还原了这片沙漠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艰辛历程,以细腻鲜活的细节将当地生态变迁、历史传统与人文风情融为一体,让宏大题材兼具扎实的文学质感与真挚的情感温度。

(杨茹涵)

## 专家研讨诗集《江河大地》

由中国诗歌学会、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江河大地》——吴茂盛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以及胡丘陵、吴思敬、刘琼、树才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王山主持。

《江河大地》是诗人吴茂盛创作40年的诗歌选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与会专家认为,吴茂盛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情,借此展示丰富的内心世界,以朴素的意象和自然纯净的诗行抒写热烈的人性之美。其诗歌文本意蕴丰厚,将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地域

性的文化深耕与宏大的民族叙事融为一体,呈现出生命共同体意识、生态与文明的思考、传统与现代的交响等多元维度。

(张昊月)

## 展现中国制造业的新质力量

4月15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花城出版社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南方智造——中国制造业的新质力量》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国务院国资委原党委委员李寿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研究室主任徐东华、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彦杰、该书作者朱建华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主持。

《南方智造》精选版首发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25年第9期,全文版单行本由花城出版社近期出版。与会专家认为,该书聚焦新质生产力,以南方制造业为样本,书写领军企业的创新突围之路,真实展现了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壮阔历程,兼具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感染力与时代的思想性,为新时代工业题材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罗建森)

## 敖忠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授敖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4月20日在重庆逝世,享年89岁。

敖忠,中共党员,民盟盟员。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管窥集——文艺理论与批评》《灯火集——文艺短评与随笔》《鲁迅杂论》《鲁迅文论导读》《普通文写作》等。曾获重庆文学奖、重庆市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等。